



建设世界一流军队纵横谈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世界一流海军发展的理论轨迹

——美俄等主要海军强国建设海军的经验与启示

■庄从勇

编者按

习主席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发出了“到本世纪中叶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的伟大号召,为我军未来建设发展指明了努力方向。海军是国家军事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维护国家海洋方向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中担负着重要的使命任务,对于推进海洋强国建设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地位。海军强则海权兴,海权兴则国必盛。必须按照“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兴军、依法治军”的要求,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加速战略转型,聚力建设强大的现代化海军。

念,确保海军建设始终向着一流的标准前进。

建设一流海军,必须高度重视科技对战斗力的影响,坚持把技术创新作为推进海军建设发展的加速器

海军是技术密集型军种,海上作战在很大程度上是技术的对决。恩格斯曾经指出:“现代军舰不仅是现代大工业的产物,还是现代大工业的缩影,是一个浮在水上的工厂。”从桨船舰队、风帆舰队、蒸汽铁甲舰队、核动力舰队到信息化舰队的发展历程来看,海军愈发展,技术含量愈高,在海上作战能力生成的比重愈大。现代海军武器装备大致可分为16个技术领域50余类上百余项,几乎涵盖了社会发展所有的最新技术。基于海军建设对科学技术的依赖,主要国家总是力求将最新技术运用于海军建设和海上作战。众所周知,第一艘蒸汽机轮船、第一艘用于实战的潜艇、第一架飞机、第一艘核潜艇均由美国研制。技术创新让美国海军仅用不到70年(1880至1945年)的时间就从一支近岸型海军发展成为全球型强大海军。战后美国海军为了保持全球领先地位,又始终着眼战争形态变化,坚持技术引领,形成从保持核打击优势到信息作战优势的清晰发展思路。近年来,面对俄国等不断发展的联合作战能力,美军提出了“第三次抵消战略”,强调利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3D打印等技术进行创新突破,企图保持绝对领先地位。着眼日益激烈的技术竞争态势,新形势下建设一流海军,必须牢固树立科技是核心战斗力的思想,准确预测未来海上战争形态和作战样式,做下一代海战的设计者、引导者、主导者,将世界新军事变革的技术成果广泛应用于海军军事理论创新、武器装备建设、军事训练、人才培养等工作,着力争夺未来海战的制高点。

建设一流海军,必须准确把握海洋自然地理条件与地缘政治态势,确立符合自身国情的海军发展战略路径

海军是在海洋空间活动的军事力量,海洋自然地理条件与地缘政治态势对海军建设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各国海洋自然地理条件不同,面临的地缘政治态势不同,海军建设发展的战略路径选择也有很大差别。日本明治维新后,海军力量迅速发展,通过赢得中日甲午海战、日俄对马海战取得了亚洲最强海军的地位。但此后日本不顾其岛国战争资源与潜力有限的实际,急速扩大其侵略目标,在陆上企图全面占领中国,在海洋则发动太平洋战争,最终免不了失败的命运,其海军发展也由此走上终结之路。二战中日本海军消亡原因很多,未能根据其海洋自然地理条件与地缘政治态势作出符合实际的战略决策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相比之下,冷战时期,苏联根据其出海口少并面临北约围堵的实际,选择了发展核舰队的战略路径,成功地与美国在全球大洋抗衡。显然,各国自然地理情况不同,面临的威胁不同,海军建设发展的路径也不可能千篇一律。建设一流海军,应当透彻分析国家海洋自然地理条件与海洋地缘政治态势,做到扬长避短,趋利避害,合理确定路径目标,努力使海军建设发展的战略指导与客观实际相吻合。

建设一流海军,必须着眼海军建设发展的特点规律加强战略管理,确保海军建设各项工作系统、连续、高效向前推进

海军建设综合性强、投入大、主战兵力形成战斗力周期长。为了更好地

统筹各个项目、高效使用资源、用最短时间形成战斗力,必须采用科学高效的管理手段与方法。二战结束以来,美国海军长期保持世界一流的位置,这既是其重视技术创新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其采用了较为先进的管理手段方法。20世纪60年代初,曾经担任过福特公司总裁的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出任美国第八任国防部长。面对美国三个军种相互争夺国防经费的突出矛盾,麦克纳马拉致力于推广他的“规划计划预算系统(PPBS)”,以此规范美军各个项目建设,初步解决了长期存在的项目冲突或重复现象,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效。无独有偶,冷战结束后,随着苏联解体,俄罗斯军事实力急剧下降,但20世纪90年代末,俄罗斯开始建立“基于目标纲要法”的军事力量建设规划,提出了俄罗斯武装力量建设规划的基本原则和一套流程与方法,并在进入21世纪后逐步完善,对于确保俄罗斯保持世界第二军事强国地位同样发挥了积极作用。当今美俄两大军事强国军事力量建设的实践证明,建设一流海军必须拥有一流的管理手段方法。新形势下,海军建设应当在汲取主要国家先进的战略规划理论基础上,创新符合自身实际的战略管理理论,健全完善战略管理机制,为海军建设搞好顶层设计与整体统筹,为重大项目建设与资源投入投向决策战略评估提供科学决策依据。

建设一流海军,必须善于使用海军力量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战略利益,以此不断增强海军建设发展的内在动力

海军是“富国利器”。建设一流海军离不开强大的国力支撑,但国力再强,也难以支撑那种没有产出的海军投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启动了“大海军”建设计划,并取得一定

成效。德国发展大海军的企图是像英国那样获得更多的海外殖民地,但这与英、法等列强的海洋利益形成明显的冲突,加之陆上方向又面临法、俄的战略压力,导致德国与英、法、俄三国进行了激烈的军备竞赛,并因此而债台高筑。日德兰海战中,德国公海舰队被英国困锁港内,成为无用的摆设,未能保护德国与欧洲大陆以外地区的海上贸易,战后海外殖民地和商业利益也被协约国瓜分。德国大海军建设不仅没有有效获得海洋利益,而且让国家背上沉重负担,其走向没落也是必然。德国建设海军使,其陷入巨大“资源黑洞”的历史说明,海军建设不能无限制地消耗国家资源,应当想方设法为国家赢得利益财富。必须形成海军经费投入与维护国家利益的良性循环,确保海军建设发展内生动力持续增长。

建设一流海军,必须努力提升海军国际战略影响力,在维护全球海洋和平中发挥积极作用

没有国际战略影响力的海军难以称其为一流海军。海军拥有国际战略影响力,除了其必须具备的海域控制能力外,还需要在全球海洋事务中拥有话语权。战后美国海军一跃成为最强海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在世界反法西斯的海上战场上发挥了应有的作用。而苏联海军的强大,则是其展现了对抗美国海洋霸权的形象。与海军发展硬实力相比,提升国际战略影响力是更加重要的课题,也是建设一流海军的应有之义。新形势下建设一流海军,要顺应历史潮流,积极履行国际义务,加强海洋安全合作,参与全球海洋治理,为维护世界海洋和平、为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持续发挥积极作用。当前,海军按照近海防御、远海护卫的战略要求,逐步实现近海防御型向近海防御与远海护卫型结合转变,构建合成、多能、高效的海外作战力量体系,提高战略威慑与反击、海上机动作战、海上联合作战、综合防御作战和综合保障能力。这些都既需要一流理论、一流装备、一流人才和一流编组,同时也需要一流的训练,让一流理论、装备、人才、结构在科学严格的训练中迸发出强大能力。

战建需耦合

■张奇 姬伟杰

挑灯看剑

随着改革强军进入“新体制时间”,如何适应“战区主战、军种主建”新的指挥与管理体系,有效应对现代战争、提高部队指挥作战与建设管理的能力效率,以信息化战争制胜机理为基准,实现主战与主建二者良性耦合,已成为亟待研究解决的重大战略问题。

战建观念耦合。战区主战,关键在战、价值在战;军种主建,贵在抓建为战、抓管为战、以建促战。主战的战区与主建的军种,都要坚持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勇于改变机械化战争的思想定势,树立信息化战争的思想观念;改变单一军种作战的思维定势,树立诸军兵种一体化联合作战的思想观念;改变固守部门利益的思维定势,树立全军一盘棋的思想观念,真正把体系作战、信息主导的理念,体现在研究战争、准备打仗的方方面面,以实战为标准,强化作战问题研究,真正把对手搞透,把战场情况搞透,把作战方案做实,把军事能力建设抓实。对于摸索出的有效经验、总结出的基本规律,要及时上升为法律法规,用法治的方法将其固化下来,以达到主建与主战功能顺利衔接,共同提升战斗力。

战建人才耦合。军队指挥,执战争之龙头,系战力之引擎。联合作战指挥人才应该既是精通某一作战指挥专业的“专才”,又是通晓三军作战指挥、军兵种知识的“通才”。作为主建的军种,要按照军官职业发展路径和不同阶段能力生成要求,区分不同层次、类别,细化明确交流任(代)职的对象、方式和范围,系统规划各级指挥干部的成长“路线图”。打通轮岗交流、交叉任(代)职的通道,进行军政、指技岗位互换,通过多个岗位、多个机构历练,提高联合作战指挥能力素质。作为主战的战区,要依托部队重大活动、联合处突实战化训练等,丰富指挥干部联合作战知识、强化联合意识、培养联合思维、提高联合作战行动能力。充分调动指挥干部主动性创造性,变被动接受联合知识向主动创新训练模式转变,探索推广理论学习、敌情分析、专业训练、要素演练、战术作业、指挥演习、联合评估等内容配套的“博弈式”全程对抗训练方法,逐步形成联的意识、联的自觉、联的行动。

战建规划耦合。适应和创新,尽管都是一种生存状态,但生存的质量却有高下、优劣之分。二者相比,适应是属被动迎合,创新则是主动出击。不落入别人的老路、套路,开辟自己的新天地,当属战建耦合之真谛。作为主战的战区,可通过细致的作战研究,深入论证未来作战需求。作为主建的军种,应根据履行使命任务需要,针对未来作战军事需求超前设计,以军事需求牵引军队各项建设。通过加强未来作战需求论证研究搞好顶层规划,从总体上把握军队建设的方向和重点,从战略高度和长远发展考虑军队武器装备、人员素质的综合全面发展,正确处理军队建设的主与次、急与缓、轻与重,紧紧抓住主要的、关键的,推动军队建设协调发展,科学合理,规范有序,持续发展。

战建能力耦合。我们常说“剑不如人,剑法胜于于人”,但这决不能成为只练剑法而不重剑的托词。在信息化战争中,要攻克制胜,不仅需要剑法过人,还要“剑”胜于人,军种主建与战区主战正是这种剑与剑法的关系,必须实现二者耦合:作为主建的军种,要重视发展军事高新技术,加强技术超前预研,努力解决制约新型作战力量发展的瓶颈技术难题,力争形成“不对称”优势和后发优势,以新质战斗力建设带动军队改革发展整体跃升,构建以实时、同步、精确打击为核心的体系作战新模式。作为主战的战区,要依托新型作战力量实现对战场“游戏规则”从适应到打破再到重构的“三级跳”,不断研究基于新技术的新型武器装备的作用机理,按照从理论到实验室,再到演习场再到战场的步骤进行战法研究和创新重构,加大信息化条件下联合作战构想、战法方法、战法体系创新力度,做到比敌人反应更快、看得更清晰、指挥更灵便、力量更聚焦、打得更精准。

观点争鸣

●当前,国际上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的竞争与对抗,虽然可称为各种各样的“战”,但它们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战争。只有在战争时期,这些领域的对抗与战争并存,并且服务和服从于战争的目的时,它们才会成为战争的一个方面。把一切社会斗争现象都看成是战争现象,把一切斗争形式都看成是战争形式,必然混淆战争现象与非战争现象之间的界限,现实是人们并非时时刻刻生活在战争的海洋之中。

在当代,信息化战争这一新的战争形态登上历史舞台。有人认为,信息化时代的战争不仅是政治的继续,而且也将成为非政治群体谋取利益,显示其存在的一种手段。从战争发动者看,除了国家和国家集团外,恐怖组织、民族部落、贩毒集团及犯罪团伙均可能发动战争,甚至掌握计算机技术个人也可以利用网络发动一场特殊战争。也有人提出,在信息时代,军事、政治、经济以及科技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进一步加深,使得交战双方围绕战争而展开的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斗争异常激烈,经济制裁、外交斡旋、武器禁运等非武装斗争形式在战争中的作用更加突出,并被纳入到战争范畴。还有人声称,在信息时代,由于信息化战争模糊了战争准备和战争实施的界限,人们将时刻生活在战争的海洋之中。总之,在一些人看来,随着战争主体和战争内涵的扩大,战争的政治本质泛化了。其实,战争的本质属性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

信息时代战争的本质泛化了吗

■许炎 傅婉娟

信息时代的战争并没有消解战争固有的政治属性。在信息时代,尽管信息技术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传统军事对抗的面目,但战争仍然是达成政治目的的最高斗争形式,仍然是流血的政治。信息时代战争主体的扩大,并没有否定战争是为某个阶级或国家的政治目的而进行的。我们看到,正是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武器高精度、强毁伤、超视距等特性,加速了战争进程,减少了拥有高新技术武器一方的伤亡及战争的附带伤亡,从而刺激了某些国家利用战争实现其政治目的的欲望,强化了战争作为实现政治目的的手段的功能。当前,国际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的竞争与对抗,虽然可称为各种各样的“战”,但它们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战争。只有在战争时期,这些领域的对抗与战争并存,并且服务和服从于战争的目的时,它们才会成为战争的一个方面。把一切社会斗争现象都看成是战争现象,把一切斗争形式都看成是战争形式,必然混淆战争现象与非战争现象之间的界限。

信息时代的战争并没有消解战争固有的暴力属性。随着信息化战争的

心理战、媒体战越来越突出,战争开始“软化”“慈化”了,战争越来越“文明”了,暴力性将不再是战争的突出特征;信息化战争可以以不流血的方式进行,将由硬打击转为软毁伤,由血与火的搏击转为精神、意志和智慧的角逐。众所周知,战争不仅有暴力手段,还有非暴力手段。在战争中,暴力手段与非暴力手段是相互作用、相互补充的,虽然暴力手段有赖于非暴力手段的配合与支持,但非暴力手段必须以暴力手段为支撑,武力对抗、暴力对抗始终是达成战争目的的主要方式。冷战后发生的几场战争,没有一场不表现出激烈的、残酷的暴力对抗。信息化时代的战争仍然是流血的政治,离开了对抗,离开了暴力,就不成其为战争。

信息时代的战争并没有消解战争固有的军事属性。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论述战争的军事本质时指出:“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个战争的目的,就是战争的本质,就是一切战争行动的根据,从技术行动起,到战略行动止,都是贯彻这个本质的。战争目的,是战争的基本原则,一切技术的、战术的、战役的、战略的原理原则,一点也离不开它……它普及于战争的全体,

贯彻于战争的始终。”当代战争作为一种初级形态的信息化战争,虽然是一种有限的、可控的战争,但主体上依然是使用武力迫使敌人服从自己意志的暴力行为。伊拉克战争爆发之前,美国对伊拉克进行了长达几个月的心理战,结果并未分胜负,双方最后还是在战场上进行较量。当然,今天军事上消灭敌人,主要是指解除敌人的武装,使之丧失战斗力、抵抗意志,而不是简单地消灭敌人的肉体。

信息时代的战争并没有消解战争固有的利益属性。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而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因此,对战争本质认识的深化还需要进一步深入到政治背后的经济,从社会经济活动中去寻找战争的根源与动因。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战争这一社会现象仅仅同社会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相联系,从根本上说,是“私有制引起了战争,并且永远会引起战争”。暴力最终根源于经济关系,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结论。马克思主义在战争根源问题上的理论贡献,在于揭示了不同利益集团间的政治、经济利益的对抗是战争产生的直接根源。虽然私有制和阶级是战争产生的一般根源,但私有制和阶级

并不等于战争。不同利益集团间的交往矛盾只有从非对抗性矛盾发展为对抗性矛盾,并且这种对抗性矛盾运用一般的和平手段再也无法解决时,才最终演变成战争。

信息时代的战争并没有消解战争固有的强权属性。以压迫、掠夺和控制为目的的霸权逻辑和强权政治是引发战争的直接原因。在当代,亨廷顿把战争的原因归结为“文明”或“文化”的冲突。然而真正起主导作用的是一些国家奉行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特别是有的霸权国家在不断地为其对外扩张寻求战争缘由和代理人战争。霸权主义挑动战争、推行强权政治的一个根本目的,就是攫取和控制别国的资源与市场,建立有利于自己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北约发动科索沃战争的借口是南联盟国内的民族与人权问题,提出“人道主义干涉论”;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理由是萨达姆的独裁统治、研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及支持恐怖主义活动。在当代以及今后相对长的时期,在世界范围内私有制仍将存在,大小霸权主义则是私有制政治的衍生物。2003年3月,美国不顾绝大多数国家反对,绕过联合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具有赤裸裸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特征。